

亲历中国丛书

主编：李国庆 郭又陵

黄色的神祇 黄色的人民

HUANGSE DE SHENQI HUANGSE DE RENMIN

(匈) 李盖提·拉约什◎著

刘思嶽◎译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亲历中国丛书

主编：李国庆 郭又陵

黄色的神祇 黄色的人民

(匈) 李盖提·拉约什◎著

刘思嶽◎译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色的神祇 黄色的人民/(匈)李盖提·拉约什著;刘思嶽译.—
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6

(亲历中国丛书)

ISBN 978-7-5013-5559-4

I. ①黄… II. ①拉… ②刘… III. ①中国历史—史料—民国
IV. ①K258.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52405号

书 名 黄色的神祇 黄色的人民
著 者 (匈)李盖提·拉约什著,刘思嶽译
责任编辑 耿素丽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50

字 数 33.3千字

印 数 1—2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013-5559-4

定 价 45.0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我社《亲历中国丛书》中的一种。

《亲历中国丛书》收入清末民国来华外国人的亲历纪实性著作,包括探险游历记、笔记、考察报告、出使报告、书简、日记、回忆录等。其出版肇始于2004年。迄今为止共计出版19种19册。其中包括:《我的北京花园》(2004年),《窥视紫禁城》(2004年),《帝国丽影》(2005年),《港督话神州(外一种)》(2006年),《穿过鸦片的硝烟》(2006年),《五口通商城市游记》(2007年),《我看乾隆盛世》(2007年),《北京与北京人(1861)》(2008年),《玄华夏——英人游历中国记》(2009年),《清末驻京英使信札(1865—1866)》(2010年),《西山落日——一名美国工程师在晚清帝国勘测铁路见闻录》(2011年),《文明的交锋——一个“洋鬼子”的八国联军侵华实录》(2011年),《一个传教士眼中的晚清社会》(2012年),《走向没落的“天朝”——德国人看大清》(2013年),《古老的农夫 不朽的智慧》(2013年),《汉人——中国人的生活和我们的传教故事》(2013年),《中国和八国联军(上下卷)》(2014年),《清末商业及国情考察记》(2014年),其中2004—2010年出版的11种10册封面设计风格一致,2011年起设计风格做了较大调整,更加凸显了这套丛书的史料性。

揭示文献,服务学界,是我社的一贯宗旨。我们相信,通过

这套丛书编译人员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把选题新、译文好的译作源源不断地奉献给读者。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国人提供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另一视角,为学界提供更为丰富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5年4月

译者的话

本书作者李盖提·拉约什(1902年10月28日出生于包洛绍焦尔毛特,1987年5月24日卒于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东方学家、语言学家、蒙古学家和土耳其学家,也是作家和翻译家。

李盖提在家乡的中学毕业后,考入布达佩斯的彼得·帕兹玛尼大学,攻读古典语言学和土耳其语。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1925—1928年留学法国,在巴黎索邦大学攻读蒙古学、藏学和汉学。

1931年,李盖提开始在布达佩斯的彼得·帕兹玛尼大学执教,教授中亚历史。从1932年起,他成为蒙古语言学教师。1934年成为该大学东亚系讲师。1939—1950年,担任系主任,并教授东方人民历史。其间,1941—1945年任匈牙利民族科学研究所所长。1950—1972年,领导彼得·帕兹玛尼大学内亚细亚教研室,并担任教授。1964—1972年,还兼任土耳其语教研室主任。在大学执教的同时,他在匈牙利科学院阿尔泰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小组组长。1982年成为布达佩斯罗兰大学名誉博士,1984年则成为塞格德的尤若夫·阿提拉大学名誉博士。

李盖提34岁(1936年)即成为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1947年成为院士。从1949年开始担任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一直到1970年,其间在1956年和1957年之交任代理院长。

他主持建立了科学院东方学委员会。1969年,他领导重组了克勒希·乔马·山多尔协会,担任首任会长,1978年后成为名誉会长,直到去世。李盖提1950年创办《向东杂志》,1973年创办《东方研究》杂志。

李盖提于1928—1930年到中国内蒙古地区和北满洲考察。此外,他还到过阿富汗(1936—1937)和日本(1940)。他研究东方学和考察东方,主要是因为匈牙利古代史研究的需要。他首先是作为蒙古学家享誉世界,有很高的蒙古语水平,还通晓满语,这在国际东方学界亦属凤毛麟角。他学识渊博,著述甚丰。其学术著作多与蒙古有关,但他在土耳其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写过多部东方学专著、考察笔记和游记,如《在阿富汗的土地上》(布达佩斯,1938)、《陌生的内亚细亚》(布达佩斯,1940)、《匈牙利语里的土耳其元素及其由来》(布达佩斯,第1册,1977;第2册,1979)。他是多个东方语言的匈牙利文标准译写法的创造者,还翻译过《蒙古秘史》等历史巨著。他拥有一个藏书11000册的私人图书馆,后来捐献给塞格德大学克莱贝尔斯伯格图书馆,创立了东方学藏书部,以推动文科系阿尔泰学和草原史的教学和研究。

李盖提在匈牙利资本主义时期生活了40多年,在社会主义时期也生活了40多年。他在各时期都倾心于学术研究,勤于东方学的耕耘。他一生获得褒奖无数:科舒特奖金(1949)、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红旗勋章(1970、1974)、劳动勋章金质奖(1975)、蒙古和土耳其的国家奖、科学院金质奖章(1967)、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尔泰学金奖(1968)……

与西方汉学界相比,中东欧国家来华考察者较为罕见,而

深入中国腹地，走访穷乡僻壤，并且一呆就是三年，恐怕李盖提是第一人。作为一个比较弱小的中东欧国家的年轻学者，他不像西方列强的代表或传教士那样，多少抱有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意图，也不像某些西方学者、专家者流，打着科学考察和学术研究的旗号，从事盗窃中国古代文物、奇珍异宝的活动。这本旅行记，叙述作者在内蒙古和满洲度过的三年中的一年，即第二年的经历。正如他自己所说，“促使我走上内蒙古之旅的，不是猎奇和探险的欲望，也不是对异国情调的向往，而是那些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问题。我和一个仆人前往蒙古，进行了地地道道的‘巡行’，一个接一个地探访那里的寺院，并与寺庙里的人同吃同住。我看到了一般考察之旅看不到的东西：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居。我见证了人们的喜怒哀乐，以及在平淡无奇、灰色单调的日常生活后面，一个宗教的衰亡和一个曾经横行天下的强悍民族的沉沦。”

李盖提怀着对东方人民的好奇心，以对科学的虔诚、痴迷和执着，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跋山涉水，甚至冒着被土匪抢劫的危险；为了研读经书，他不惜叩访破庙颓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他不顾酷暑、严寒，埋头摘录经文，晚上睡觉与虱子和跳蚤为伴……可以说，他不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地猎奇，浅尝辄止，而是寻根问底，一探究竟。在发掘佛教经文典籍的同时，李盖提还深入观察、体验当代蒙古族人的生活，与他们朝夕相处、同甘共苦，忠实记录他们的宗教活动、日常起居、风俗习惯和悲欢离合，这些描述不乏生动和贴切之处。

他需要与各种人打交道：上至王公贵族、活佛高僧、省长总

督和县市衙门的官吏,下至普通僧侣、士兵农民和贩夫走卒;他住过豪华旅馆、王府宅邸,也住过简陋肮脏的客栈大通铺、四壁萧然的僧房甚至残垣断壁的废墟。

李盖提不掩饰他对中国“这个世界最古老文化的摇篮”的仰慕。游记中多处提到中华文明、艺术和哲学的博大精深,由衷地赞美古都北京的名胜古迹和文物。同时,他也不讳言对当时的中国“以怪诞、扭曲的面孔迎接一个远来的异国人”的失望。

除了学术考察之外,他的游记比较忠实地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面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大屠杀后的惨烈景象,蒋介石登上权力顶峰但无法制止军阀混战,到处是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从上到下腐败成风,灾祸连年,瘟疫横行,盗贼蜂起,民不聊生……

这本游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相当多的篇幅谈及匈牙利人与远东的关系。游记阐述了匈牙利东方学包括蒙古学发达的原因,特别是匈牙利主体民族马札尔人的迁徙史和与土耳其人、蒙古族和其他远东民族的历史渊源。有关匈牙利人起源的问题,在匈牙利和欧洲研究和争论已有好几个世纪,但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定论。匈牙利位于中欧,匈牙利语属于芬兰—乌戈尔语系,处在操斯拉夫语、拉丁语和日耳曼语民族的包围之中。有关匈牙利人的起源,在匈牙利学术界历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欧洲起源论,二是脱亚入欧论。相当多的人认为匈牙利人起源于亚洲,与历史上的匈奴族人,现在的蒙古族人、维吾尔族人甚至裕固族人有血缘关系。匈牙利的东方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到远东、中国考察的“寻根之旅”不绝如缕,常被

谑称为“走亲戚”。最近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说“匈牙利人是半个亚洲人”，又引起有关匈牙利人起源的争论。本书作者李盖提是“欧洲起源论”的主要代表，但是他不否认匈牙利的语言和文化受亚洲民族影响的史实。

本游记夹叙夹议，评论颇多。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中国历史版图和行政区划的形成和变迁的叙述，受西方某些偏颇的理论和对中国及中国人的成见影响较大，特别是在汉人与中国主要少数民族蒙古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的关系及其历史演变等问题上，并非完全客观公正，如有关“中国殖民者”的说法，显然是取自某些西方的理论。读者应该以批判的眼光阅读。

刘思嶽

2014年夏于匈牙利圣安德烈市

前 言

一个刚开始从业的匈牙利东方学学者到亚洲进行语言和文化史考察,已差不多六十年了。其考察的目的是发掘远东的蒙古地区,一个有着伟大历史的人民的独特的、古老的文化。年轻的学者当时正迈出其独立的学术生涯的头几步,而后来成为匈牙利东方学的泰斗。他因其辉煌的学术理论著作和杰出贡献,获得所有应得的科学和社会褒奖。他把亚洲内陆学研究引入匈牙利的科学领域,创建了一个享有国际声誉的匈牙利东方研究学派——这是他一生科学事业最主要的成果。

他的创举和果敢勇毅的考察活动,都是在经过精心的学术准备后进行的。他在布达佩斯大学和厄特沃什学院就读几年后,又在巴黎的东方学工作室进行了数年研究工作,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自己的精神学养。在那里,他的导师是国际东方学的巨擘保罗·佩里欧。这位巨匠,除了其无与伦比的才能外,由于命运的安排,在发掘亚洲内陆亚细亚的语言和文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他的生平和学术著作,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人员来说,本身就预示着,需要不断寻找新的源泉;同时也意味着,要用日常生活的经验来补充和深化所掌握的学术知识。

确实,这是他巴黎精神之行承载的最本质的因素之一;另

一个因素是从匈牙利的科学精神获得的激励。

这正与对匈牙利民族的悠久和深远的东亚关系的科学考察的需要相契合。对于一个初出茅庐,但在精神上已十分执着的年轻学者来说,这是真正的、可以穷其一生追求的生活目标。他能够依靠最好的学校的精神资本,在克勒希·乔马·山多尔开辟的荆棘小道上出发,但可以更自觉地、怀抱着肯定成功的希望,为自己划定通往目的地的道路。

李盖提·拉约什在 20 年代末,踏上了考察中国蒙古族人的旅程,并撰写了考察报告。

让我们在此停一下,感受一下与这一时期有关的氛围。

本书作者是途经英吉利殖民帝国那些为人熟知的堡垒:塞得港、苏伊士、阿登、科隆坡和香港抵达远东的。他到达的那个中国,当时表面上执政的是孙中山革命后产生的体制和机构,但是在社会深处,已运行着其他力量。

与其说中国仍旧是列强实现其征服野心的战场,倒不如说是牺牲品。此时,该国——以历史的步伐计量——离日本的侵略战争仅有几分钟时间了。她与所有人——首先是她自己——都有冲突。无政府主义和混乱、腐败成风和盗贼蜂起就是这个国家的真实写照。

这一切是“环境的独特之处”,如果我们看看科学考察的本来目的,这对于本书作者来说几乎是无关紧要的。但李盖提·拉约什的书仍给我们提供了 20—30 年代中国的生动写真。这是无与伦比的时代文献,是一个目光敏锐、有相当写作水平

的旅行家撰写的游记。他的评判不是受伟大的政治空话，而是受日常生活的现实引导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读了这本旅行记后，我们对二十年后人民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宏大改造，理解和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所有这些，对于李盖提·拉约什来说——可以理解——仅仅是一条副线。他感兴趣的首先不是中国整体，而是蒙古民族的问题。真正吸引他的是成吉思汗的后人的语言、习俗、佛教——喇嘛教的信仰世界。他试图把握一个很多世纪以来在亚洲内陆和中国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文化的过去和现在。他为描绘这一画卷搜集素材，制定了周详的计划。

他的描述，把蒙古族生活的真实而鲜明的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循着文明和宗教的遗迹，可以看到历史的深处——同时我们一刻也不会忘掉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一现实影响着那里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规定着考察者的活动。

我在大学学习东方学的年代——差不多在本书出版二十年后——李盖提·拉约什的这本旅行记和作者另一本出色的书《陌生的亚洲内陆》一起，按照不成文的惯例，属于我们的必修读物。其著作引人入胜的主题、清晰的思路和刻意强调的学术纲领，以及犀利的文风，在当时也是令人折服的。

今天，在我为写作“前言”而通读本书时，这些往事历历浮现在我的眼前。也许最先出现在记忆里的，是这本书对于很多人来说起着磁石的作用：使他们与东方的文化或者东方文化的

耕耘——东方学，建立起毕生的联系。

今天——在将近四十年过去后，我在放下这本书时，感到它是一本促使人们进行不同的价值体系判断的作品。在我的心中，这个想法已凝成坚定的信念：随着岁月的流逝，作者的旅行记已成为铜绿斑斑的时代记录，已上升到历史源泉的等级。在这一高度上，本书理所当然地会引起涉猎远东的近现代历史的读者，以及从匈牙利的东方学传统思想范畴出发研究亚洲内陆地区的人们的兴趣。

豪泽伊·捷尔吉^①

① 豪泽伊·捷尔吉：1932年4月30日出生于布达佩斯，现年83岁。匈牙利的突厥语言文学专家、东方学家。匈牙利科学院院士。

1950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布达佩斯的厄特沃什·罗兰大学文学系博物学—东方学（突厥语言文学）专业。受教于内梅特·久洛、李盖提·拉约什和费凯泰·拉约什等著名学者。

1954年大学毕业。1956—1957年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大学当客籍教师。回国后在匈牙利科学院语言科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1963—1982年期间，在柏林洪堡大学和德国科学院工作，系客籍教授。1982年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通讯院士，1995年成为院士。1984—1990年，任科学院出版社社长。1991年任匈牙利科学院语言科学研究所东方学工作集体科学顾问，后为研究教授。1992年任塞浦路斯大学突厥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1991年被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2002、2003年，为安德拉什·久洛布达佩斯德语大学的创办人和首位校长。

1985—1994年间，任克勒希·乔马·山多尔协会会长，后为名誉会长。1991年曾任东方和亚洲研究国际联盟秘书长。

引言

发现亚洲—神秘的东方—求知欲和权力欲—匈牙利和东方学—突厥学的大本营—循着神鹿的足迹—新的匈牙利古代史研究—了解第一个“异教徒”千年生活的真谛—我们与蒙古族有何渊源—遗失的宝藏—兹奇·耶诺伯爵和中国官吏的故事—是什么吸引我去内蒙古—我的考察之旅的最初计划—莫斯科的干预—终于抵达现场—从中国的单耳桶到俄国的手提桶—大胃口的中国—他的胃口更大—一个沉沦的世界

当欧洲在18世纪发现亚洲的时候，曾在鞑靼可汗的王宫倘佯过的第一批使团的成员，说起过奇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趣闻轶事。历史上，在不大知名的前辈之后，马可·波罗——伟大的鞑靼可汗的心腹和顾问，成为第一个著名的周游亚洲的旅行家。

他的有关中国、鞑靼人和鞑靼可汗的所有记述是如此恢弘和令人难以置信，以至可怜的他直到生命的终点，都不断受到质疑和嘲讽。人们要求甚至威胁他，要他迷途知返。然而这位“不知悔改的怪人”直到临死也不愿收回他的“荒诞无稽”的故事。

而今天,这些“荒诞无稽”的游记却成为西方有关13世纪的鞑靼人或蒙古人的最珍贵的史料,其可信度为大量波斯文、汉文和蒙古文的同时代文献和报道所证明。

马可·波罗逝世后,很多人到过亚洲。旅行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信函和游记等,描述了不仅在鞑靼人,而且在或远或近的其他民族那里的所见所闻。

亚洲一直是神奇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之乡,直到白人发现美洲并且开始用铁与火对这片大陆进行殖民征服为止。自此,欧洲感兴趣的不再是神奇的、神秘的东方,而是富饶的、到处是宝藏的亚洲及其沉睡的力量。欧洲亟欲获得新的资源,可能的话,采取怀柔的手段,必要时则诉诸暴力。欧洲人首先用暴力强迫那些戒惧异族、闭关自守的人民与他们通商、建立经济关系,继而要求得到让步和特权。最后,他们攫取土地。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则满足于获得宗主权或保护国的地位。

殖民主义的大师们很早就认识到,为达到他们的目的,了解有关东方民族的语言、习俗和历史,是比大炮、军舰更需要的、更有效的手段。因此在欧洲,产生了东方学,并很快获得长足的发展,因为它可以得到一切所需的外部帮助。须知,东方学研究是很费钱的学术事业。东方学研究需要有不断扩充的图书馆和大量书籍,需要与被考察研究的民族和人民建立持续不断的关系,要组织大大小小的考察旅行,研究与东方人民有关的地理、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现在没有地方在这方面舍不得花钱。在英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和美国都相继建立了东方语言的学院。在大学里设立了东方学系或选修课程。在东方,则建立了专门的机构,系统地解决科研力量的补充问题。

我们匈牙利人从未有过殖民主义的图谋,相反我们需要与类似的图谋作斗争——我们在东方亦无商业利益,因为与东方贸易的人民首先是乘船航行的民族。一个站在远处旁观的外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东方学与我们,就像与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或罗马尼亚人一样,没什么关系。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欧洲科学界的兴趣转向东方以来,我国不断出现东方学家,研究各种不同的语言和问题,不是成批出现,而是犹如一棵棵孤立在大沙漠中的大树,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东方学有一个分支,在我国,由于持续不减的兴趣和连续不断的研究工作,成为有深厚底蕴的传统学科,以其丰富的、有第一流价值的科学文献享誉世界,这就是突厥学,即对突厥人民的古代和现代语言、历史状况等进行研究的学科。在这一领域,我国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除了奥斯曼土耳其外,只有俄罗斯超过我们。但是不要忘记,这主要是因为经济、政治和其他利益使然,须知俄国人口中有大约 2000 万人讲土耳其语。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在俄国,从人口比例上看,土耳其人是继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后第三大族群,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1925 年在巴库举行的突厥学大会——我国没有代表参加——专门提到匈牙利科学界在此领域所作的贡献。基尔大学的一个教授门采尔称匈牙利为突厥学的大本营^①。

我国这一坚持不懈、近乎狂热、获得国外科学界交口称赞

^① 门采尔:《在巴库举行的第一届突厥学大会的成果》,见克勒希·乔马:《文献》第二册,第 145 页。